

小 序

王克非同志此书，选题很好，材料丰富，论述得当，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近代中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对于两国学者如何摄取西方思想以及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做出了独到的分析，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对古汉语、英语、日语和思想史知识的掌握，保证了这一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的完成。我赞成他在研究中不是以论代史，而是发掘材料加以分析论证，通过客观深入的研究得出实而不空的结论。

克非同志的导师许国璋先生是一位道德、文章都令我敬佩的人，这本书无疑也凝聚了他的睿智卓识，我写下这几句话，寄托了我对国璋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季 羨 林

1996. 6. 20

学术评语

王克非同志的博士论文将翻译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是一个创新。我们以往的翻译史研究很薄弱，且偏于翻译史实，对于翻译中包含的外来思想的摄取，未予以足够的注意。王克非的论文弥补了这一环节。他勤于学习和思考，利用掌握的外语、古汉语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抓住了比较中日学者摄取西方思想这一极有意义的课题。文中不仅阐述了进化论和自由思想在中日两国受到的不同摄取，还一层层深入分析了摄取者的心态，摄取后的影响和两国环境对于这一过程的意义，是前人未研究到的。论文资料扎实，多有新得；论述严谨，言之有据；行文周到，结构合理，富于学术价值。可以说，这篇论文拓深了翻译史的研究，也丰富了思想史的研究。

许 国 璋

1993年12月28日

I . 绪 论

历史行进到 19 世纪，地球上的东西两方出现了不同的文化格局。400 年间，西方发生了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形态的转变，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思想解放过程，依靠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已逐步发达起来。而东方基本上仍旧生活在静滞的封闭的中世纪里，维系着悠久而陈旧的经济、政治体制。资本主义由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开始把它巨大的张力伸向世界上每一块土地。东西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且以血与火的猛烈方式进行。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强国以其强兵利器的优势，闯入了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1853 年美国的佩里（M. C. Perry）准将率领的舰队，迫使锁国二百多年的日本岛国门户大开。这种冲突，表面上是西方侵压东方，实质上是代表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近代文化同代表落后的小生产方式的宗法封建文化之间的较量。两相交锋，后者自然节节败阵。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对中国），使中国和日本面临危险的境地。

这个冲突过程，对于中国和日本是痛苦的，却又是两国挣脱中世纪，走向近代、走向新生的一个契机。马克思曾以一个西方思想家的眼光评论中国这段历史进程：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用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 页）

日本史学家并上清以几乎与此同样的话描述了日本也面临着这样的解体。在经历了一次次以无效和失败为结局的抗争后，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终于逐渐正视西方近代文明，并对自己曾经辉煌的文化 and 历史进行了理智的反思，继而探索，再而移译和摄取，执着地寻找走向进步与富强的途径。

在中国，以天朝上国之人自居的士大夫，保守而迟钝，但在虎门销烟抵御外侮的林则徐，并未因外来侵略而憎恨和拒绝西方的一切。相反，他组织士人翻译西书，认知西方，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写《海国图志》，介绍西洋各国的情况，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清朝第一位出使西欧的大臣郭嵩焘，进一步从文化的深层比较中西文化，得出中国“去西洋盖不可以道里计也”（《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 109 页）的认识。

在日本，经历了“开港与攘夷”的一番争斗之后，大政奉还于明治新政府，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未几年（明治四年，1871）便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大臣为副使的约 50 人的高级使团，出海全面考

察欧美诸国文化。当时明治政权百废待兴，他们却毅然派出了众多政府要员前往欧美细致考察，历时近两年，这在近代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这一考察，以及日本许多有志青年留学深造后回国，对推动日本近代化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和日本正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广泛地移译西方书籍，引入西方思想。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极有意义的文化现象。初期的日本明治政府励精图治，鼓励人民“上下一心”，“求知于世界”，举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自由民主思想学说、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等，如饥似渴地一并译介到日本。中国虽然是从物质—制度—心智三个文化层次一步步地才达到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真正认识，但到 20 世纪初期，对西方思想的引入和摄取也达到了高潮。这里面，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无疑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有意识地从西学中汲取本国所需要的思想养料。面对开放的国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闭关自守的愚昧和学习西方的必要：“（西方）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参看钟叔河，1985：195）。这一认识已越过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达到西方立国之本的“里”。

日本启蒙学者对西方事物的向往，对西方思想的翻译和摄取，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开始。1866 年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初编）出版，越一年，“外编”问世，两书销行“二十万至二十五万部之多”（《福泽谕吉全集》第一卷第 26 页），这套书实际上是福泽根据手头的外文书刊加上自己的欧美考察笔记，编译而成。维新之后，西书更是纷纷译入，除福泽外，中村正直、西周、加藤弘之、中江兆民等都为译介西书传播西学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翻译和摄取，用福泽谕吉的话说，是“使广大民众获得文明的新思想”（同上书，第 6 页），其译著“专以输入西洋新事物和

除我国旧弊习为目的（同上书第 60 页）。中国对西学的主动引进比日本晚，在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士中，严复是突出的一个。他这样讲述自己翻译西书的心态：“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阅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严复集》，第 527 页）。

显然，中日两国启蒙学者都是把译介和传播西学以改造本国、变革民心视为己任。他们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两国走向近代的进程，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身处被外强催开的国度，面对各种各样前所未闻的西方新思想新学说（而且各有其来源、背景和流派）当时的启蒙学者是如何加以选择和摄取的？这种摄取（往往通过翻译）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翻译（摄取）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化史上，严复的地位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他的翻译活动基本上集中于 1896—1909 年，14 年间共译出了 8 部要书，170 多万字，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名学（逻辑）、法学和政治学六个领域（按贺麟的分类）。这是很庞杂的同时又是很精到的一批译著，里面体现了他对西书的熟悉和对中国现实的洞察。而且，严译各书在各自所属领域中都是最早引进的西方学术著作。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与严复贡献相当的人物。福泽谕吉是最接近的，王中江在其博士论文《中日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严复与福泽谕吉》中，对他们两人的启蒙思想做了全面的比较。但是在翻译的选择和摄取上，福泽不比严复。他翻译了不少东西，却没有一本是经典名著^④。

另一方面，中日近代对西学书籍的翻译引入和摄取是多方面

的,仅严译 8 本书就包括六个方面。很显然,我们既不能将严复同日本某一位启蒙翻译家相比较,将严译多本译著一一与日译本比较也是不明智不可能的。因此本书主要研究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以严复翻译的两本政治哲学思想的著作 1)《天演论》,同日本最早引入进化论思想的启蒙学者加藤弘之及其《人权新说》和 2)《群己权界论》与同样翻译了此书的日本启蒙学者中村正直及其《自由之理》加以分析和比较。

我们之所以选择严复这两本书和相应的日文书作摄取史上的比较,首先是因为,对于一个要弃旧图新的国家,对于一个担负启蒙责任的思想家,引进一种新的通达的政治哲学思想或哲学观是至为重要的,也是最能发生作用的。其次,进化论思想和自由思想也确实对中日近代历史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前者之于中国,后者之于日本。第三,严复和起到相应作用的日本人加藤弘之和中村正直都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家。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引入和摄取是有考虑的,有立意的,通常也是更具有影响力的。只有对他们和他们的翻译与摄取进行分析、比较,才具有思想摄取史上的意义。

不过,严复与加藤弘之的比较同严复与中村正直的比较略有不同。严复是以译著《天演论》(虽然加了约百分之三十八的案语)引进进化论思想,而加藤弘之是以自己的撰著《人权新说》引入进化论思想的,所以在分析和比较时更侧重摄取的心态、目的及结果。当然,我们也重视富有研究价值的《天演论》的翻译本身的研究。严复与中村正直同译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 *On Liberty* 可比因素更多 可比成分也更大,但分析的重点仍是放在思想的摄取及摄取心态的比较上。

陈寅恪先生在论及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者必须“对

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载冯友兰，1961/1984）。这个观点对于所有史学一类的研究都是适用的，包括翻译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在分析严复、加藤弘之和中村正直为何引入西方哲学思想，如何从中摄取的问题时，都充分注意考察他们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和把握他们的心态与构想，更准确地解释他们的摄取

注 释

井上清（1959/1985）在《日本の历史》（中册，第9页）里写道：

“由锁国而受到保护的日本封建社会，随着开国，正如密封在箱子中的木乃伊受到外界气流的急剧冲击一样，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迅速地开始分解。”

考察的详情可参看久米邦武的《米欧回览实记》（共五册），岩波书店1980/1988出版。

该论文1991年改名为《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1991）出版。全书整体框架很好，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尤以分析启蒙思想见长；惜部分章节略为浅泛。

例如，早期学会英语后，福泽谕吉译了一本筑城方面的书，一本《海岸防御论》（均未出版），《西洋事情》“初编”是根据出访笔记和一些零碎材料编译而成，“外编”则是翻译英国人伯顿（J. H. Burton）1852年出版的一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Chamber's Educational Course: 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与严复选择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名著《原富》（又译《国富论》）不可同日而语。

- ⑤ 迄今国内对于中日近代摄取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罕见。在日本，已有两篇论文开始了这种研究。参看“参考书目”中石田雄，1976/1984；彭泽周，1971。

Ⅱ . 进化论思想的摄取

2.0 引言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西方进化论思想先后引进到日本和中国，对两国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中日近代史上很有意义的事情。中日两国启蒙学者为何引入进化论思想，如何摄取进化论思想，这种摄取与本国环境、与引进者本人有何关系？这是本章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并希望通过对中日两国不同摄取的互相观照，加深我们的认识。

2.1 关于进化论思想

进化的思想是一种关于发展变化的观念，东西方古代哲学家的著述中都不乏朴素的进化思想。系统的进化理论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法国自然科学家拉马克 (Lamarck) 1809 年在《动物学哲学》中首次提出生物进化论的学说——环境说，认为生物进化的主因是受环境的直接影响。到 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巨著发表，奠定了进化论的理论基础，标志着进化论的成熟和获得公认。

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物进化论是 19 世纪三大科学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定律，进化论，细胞学说）之一，它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其中包括了深刻的哲学内容。第一，达尔文进化论以生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的丰富材料，论证了自然界所有生物有着共同的起源并有其生存和发展的规律，破除了物种不变和上帝创造万物的神话；第二，它以大量科学材料证明，生物界的各个种、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界，包括人类，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第三，它论证了一切生物都是通过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演化发展的。并且，它的研究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实验、观察方法和逻辑学的归纳、演绎法。正是由于进化论所蕴涵的哲学意义，它一经问世，便不只为自然科学家所看重，而且受到各个学科，包括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马克思立即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解释生物界如何互相联系和转化、如何互相竞争而发展的深刻内容，并以它作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自然科学证据^①。但是，另一方面，教会深感进化论对其神学教义的威胁，因此竭力抵制和攻击。海克尔、赫胥黎等支持达尔文的科学家起而与之辩论。新旧观念和信仰发生强烈碰撞，最终，进化论成为既包含自然界进步，又包含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

几乎与此同时，哲学家们（如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等）也一直在思考进化的问题。哲学家总是试图寻找事物的普遍规律，解释一切现象所共有的特性。斯宾塞即持普遍进化观念，他在达尔文进化学说问世之前^②，已根据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物理学阐述的普遍进化的观点提出了社会进化学说，而后又将生物进化论纳入其普遍进化理论体系中（参看 Barker, 1915: 88—92）。巴尔克尔（E. Barker）认为，斯宾塞始终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是一个

哲学家，而达尔文、赫胥黎等是科学家；斯宾塞以普遍进化的观点解释世界，达尔文等人则持生物进化论，他们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几乎从未用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或创立社会哲学。

斯宾塞等关注人类社会问题的学者们提出并宣扬的社会进化论（后称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 19 世纪后半叶的一个重要思潮。它吸收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等观点，视之为普遍真理，加以夸大或曲解，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这同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昌盛时期有关。它为自由竞争、弱肉强食作了理论上的辩护。它把达尔文的进化等同于斗争，把生物跟环境的斗争说成是同一物种内个体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直接的斗争（参看 Solbrig, 1979: 19—20）；它把达尔文所谓的适者是指能够传留最多后代的个体，适者在种群中也可能是弱者的概念解释为胜利者即适者，也即强者。这样，社会进化论就主要从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这两点上利用和曲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也与达尔文的失误有关。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生存竞争概念包含有生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包含生物的保存和遗传后代，但是达尔文过于强调了生物间的生存斗争，几乎把它作为物种变异、进化的唯一原因。参看卢继传，1980）。这是把生物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相等同的认识。这种理论自然受到了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士如赫胥黎、海克尔等的反对，其中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1893）就是解释达尔文进化论，批评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原理无限制无区别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一本书。

19 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欧洲达到鼎盛时期，其中关于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概念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时，如

同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支持列强之间相互竞争，甚至以强凌弱，给人类带来不幸；另一方面它又与进步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支持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极富解释力的学说，必然对刚刚开放的东方产生影响。然而由于中日两国所处的时代环境，既有别于欧洲，又有别于彼此，进化论遇到不同的摄取，其影响或作用竟完全两样。

2.2 中日对进化论思想的引入

2.2.1 日本对进化论的引入

日本 1868 年发生明治维新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向世界、文明开化成为时尚，启蒙学者十分活跃，举西方近代文化而引入，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在明治维新的启蒙活动中，他们主要从西方思想中吸取了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尤其是“天赋人权”的观念，反对外部力量对人权对自由的干涉，批判封建的思想观念。但是进化论思想在初期尚未引起注意。据日本生物学家上野益三博士认为，最早提到“生物进化”观念的是松森胤保所著《求理私言》（1875，即明治八年）一书，但比较系统地为日本人介绍生物进化论的，一般公认是美国动物学家莫斯（Edward Morse）（参看八杉龙一，1969）。

莫斯 1877 年 6 月 17 日只身来到日本，研究腕足类动物，因为日本此类化石丰富。他的研究成果以《大森介墟古物编》为名在东京大学发表。他到东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外山正一教授推荐的（参看铃木修次，1981）。外山正一研究西方哲学，熟悉斯宾塞的理论，以进化的观点支持自由民权运动，

因此对进化论也很有兴趣，便介绍莫斯到东大任教（据八杉龙一，1969）。当时东京大学刚刚成立，仅在莫斯来日前两个月，由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成（1877年4月）初分法学部和理学部，原开成学校校长加藤弘之任第一任东京大学代理校长。莫斯从1878年起，在东大生物系任教两年，开始向日本人系统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仅给生物系讲，还在星期日用英语作关于“动物进化论”的通俗讲演。当时学哲学的青年学生井上哲次郎曾回忆说，那时“我们热心研究进化论，而且很喜欢它”（参看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1969/1983：118）。听莫斯课的学生中有石川千代松和平沼淑郎二人将听课笔记整理后，翻译成日文，以《动物进化论》为名在1883年4月出版。这是日本最早出版的生物进化论专著。这本书篇幅不大，约55000字，共9章。后8章分述动物以及人类的进化，但开篇第一章指出，要实事求是，破除宗教之说，并论证人为的和自然的淘汰，点到了进化论的普遍意义。莫斯的东京大学同事、矢田部良吉教授为此书写了“绪言”，一开头就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问世以来四方风靡。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之理人所共知，欧美和我国信奉此理者极多”。他还指出进化论既解释了动植物的变迁，又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兴废，是“至大至正”之理（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全集》27卷，《动物进化论》，32页）。

但是，日本人自己最早选择进化论加以引入的还是聘请莫斯的东京大学校长加藤弘之。早在《动物进化论》出版之前，加藤在1881年创刊的第一期第二期《东洋学艺杂志》^④上发表了“论根据人为淘汰获得人才之术”等论文，并于1882年10月出版了系统介绍进化论，进而以此解释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人权新说》。此书第一版出后不久同年12月出第二版接着在1883年

1月又出版了新的增补修订本，可见此书的社会反响之快。莫斯的讲授，在东京大学校内引起生物学界的浓厚兴趣，但引起日本社会的普遍关注，引发对于社会进化论激烈争论的，是加藤弘之的著述。此后，“进化这个名词好像长上了翅膀，飞遍整个日本，留心新知识的日本人常常开口进化，闭口进化，好像只要谈进化，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似的”（三宅雪岭《明治思想小史》）。所以日本的权威辞书《广辞苑》将“进化论”译名的创立归于加藤弘之。

2.2.2 中国对进化论的引入

朴素的进化发展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产生了，如《易》经就是讲变化的。到了前近代，清朝的统治面临内外危机，敏锐的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预见到社会变革的需要，以积极的态度提出“更法”的主张，这一主张的基础就是他们的变易进化的观念。由于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没有近代科学为基础，这种变易进化的思想还属于朴素的古代范畴。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内外危机感加重，同时，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郑观应等改良派要求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旧的封建制度进行改革，但仍受到“器可变，道不可变”思想的束缚。只是到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才在继承前人变易进化思想，吸收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方进化论中的某些成分后，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进化观（参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5）。

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最初为中国人所粗知，是1871年华衡芳与美国传教士玛高温（John Macgowan）合作翻译的《地学浅释》。这本书是根据英国地质学家莱尔的 *Elements of Geology* 一书第6版（1865年）翻译的。译稿完成于1871年，由江南制造局印行